

「在那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地方、情感及一名東亞植物學者的養成

洪廣冀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永續地球尖端科學研究中心

1886年10月某日，時年26歲、日後成為帝國學士院會員（1930）、日本植物學會會長（1936）、文化勳章得主（1946）及札幌市名譽市民（1949）的宮部金吾（1860-1951），坐在美國麻州劍橋街上的一個房間內，回想他自9月15日抵達舊金山、28日抵達劍橋以來的點點滴滴。似乎無法壓抑他的內心悸動，宮部拿出了張信紙，開始寫信給他最好的朋友：當時正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的新渡戶稻造（1862-1933）。延續他們都在東京英語學校就讀時的習慣，他以英文書寫這封信；而他很確定，當新渡戶收到他的信後，這名老友會如往常般地給他中肯與充滿智慧的回應。此時此刻，這名年輕人特別想分享的是他與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阿薩·格雷（Asa Gray, 1810-1888）的相遇：

格雷博士正忙著撰寫研究論文；當我進入（格雷的研究室；筆者按）的時候，他的小狗正躺在他身邊。他是個讓人肅然起敬的老人，但有著年輕人的熱忱與活力。他非常親切且溫暖地接見我，這讓我頗感壓力。他說他一直對日本植物學與植物學者感到興趣。在交談一陣後，他說他現在年紀大了，也已從教學的崗位上退休下來，而古德爾（George Lincoln Goodale, 1839-1923；哈佛植物學教授，為格雷於哈佛的接班人—筆者按）與法洛（William Gilson Farlow, 1844-1919；哈佛大學真菌學教授—筆者按）教授將會指導我。到目前為止，我並未提及我帶來了北海道與千島群島的植物。但當我意外的提及此事，他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以巨大的喜悅與熱情說道：「啊，宮部先生，你說你曾在千島群島，且帶來了你的收藏。太棒了，你可以把它們帶來這裡，我們可以一起看看與研究它們。你也許會想看看圖書館與標本館。來，走這邊。」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宮部告訴新渡戶，格雷博士不僅帶領他參觀哈佛的圖書館與標本館，甚至還指定個座位給他，並承諾會全力支援宮部就北海道與千島群島植物相研究。「對於一名默默無聞的亞洲人來說」，宮部寫道，「這樣來自美國—或說全世界—最偉大之植物學家的招待，簡直像場夢。你或許可以想像我的感受、喜悅與欽佩」。這是另一類之科學的無私與偉大」。

在年輕的宮部心中，格雷的「招待」必然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因為，在與宮部會面不久，格雷即因中風陷入昏迷，並於 1888 年 1 月 30 日與世長辭，宮部還是勉力完成以北海道及千島群島植物相為題的博士論文。甚至，1889 年 10 月 8 日，當宮部返國、於母校札幌農學校（北海道帝國大學與今日北海道大學的前身）擔任教授後，雖說研究重心主要是在蒐集、分類及描述日本帝國境內的植物病蟲害，他還是致力於探索北海道及其周邊地區的植物相。最後，不能不提的是宮部之於日本「殖民植物誌」（colonial flora）的貢獻。所謂「殖民植物相」是大英帝國於十九世紀中期起致力推動的研究計畫，目的在於盤點帝國境內各類植物物種、找到分布模式、從而著手各種土地利用的安排。受此影響，二十世紀初期，日本帝國也如法炮製，責成北海道帝國大學的宮部金吾（庫頁島）、東京帝國大學的早田文藏（臺灣）及中井猛之進（朝鮮）進行殖民植物誌的調查與撰寫。宮部對日本帝國植物學的貢獻讓他贏得世界的聲譽。除了前述提及各項頭銜外，就宮部而言，他最珍視的是 1936 年 1 月 14 日的「御進講」。在其自傳中，宮部表示，當他得知被選為當年度的講者，沈吟再三，他決定以格雷的生涯及業績為題。當天，年近半百的宮部金吾站在時年 35 歲的昭和天皇前，娓娓道來 30 年前與格雷的相遇。格雷為十九世紀日本植物相的權威，宮部指出，而格雷以達爾文的演化論來解釋日本與美東植物相的相似性，不僅讓這位哈佛教授贏得全球的聲譽，更讓日本植物相成為植物學界矚目的焦點。值得一提的，彷彿警覺到當時日本帝國與美國間日益緊張的態勢，宮部還列舉美國自十九世紀中期發動的一系列針對日本生物相的科學調查，表示格雷—乃至於格雷所代表的美國學術界—一時為日本長期且堅定的盟友。

本演講目的便是從宮部與格雷的相遇來追問如下問題：該如何研究科學知識與科學家的「旅行」？相較於行之有年的、以實驗室及博物館等地點為主題的研究取向，旅行、移動、相遇能否成為科學史寫作的新關鍵詞？表面上看，宮部致新渡戶的信儘管動人，其內容似乎不足為奇，不過是「一名默默無聞的日本人為美國最偉大的植物學家

所吸引、負笈海外、最後成為一名成功的海歸學人」的故事而已。雖說如此「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情節多少也吻合實情，本演講卻是要將這樣常見於早期科學史寫作（乃至於當代的教育與職涯雜誌）的敘事架構予以問題化（**problematized**）。簡言之，與其花費篇幅闡述格雷如何偉大、從而讓親炙其學術與人品的宮部也變得偉大，本演講更關心的是什麼機緣及結構讓格雷與宮部兩位出身與背景迥異的個體得以相遇。顯然的，即便是當代，尋找心儀的學校與導師、申請留學獎助、取得入學許可、在人生地不熟的學術環境中求生存並取得博士學位已是個不小的工程，更不用說日本與美國才開始有著正式交流的 1880 年代。其次，呼應科學史界晚近的呼聲，即研究者有必要考慮科學社群中的「情感結構」，乃至於如科學從業者與其同儕、研究對象與儀器間「相遇時互放的光亮」，本演講嘗試把情感、情緒等貌似生理與心理的現象置於分析首位，而不是將之視為讓文字「變得有趣」的佐料，或以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等「主義」予以解釋掉。第三，本演講想追問，為何宮部得遠渡重洋、到哈佛向格雷學習日本植物的相關知識？從宮部的前引信件可見，一個以歐美研究機構為中心、而像日本這樣的非西方社會得前往歐美「取經」的學術體制正在隱隱成型。最後，考慮到格雷在演化論的證成與傳播上的特殊地位，在考察前述學術體制之成型的同時，本演講試著對稱地看待演化論的生產與傳播。到底日本的植物相是如何旅行至美東，成為格雷援引以支撐演化論的經驗證據？進而，將日本植物之特殊性予以抹除、好跟其他植物相可並置與比較的演化論，又如何旅行至日本，而日本學術界又該如何理解與詮釋此既舶來又在地的知識產物？